

# 中国东南亚史学研究的进展与评估

梁志明 李一平

东南亚与中国是近邻,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中国历来就有研究周边各邻国的优良传统,并建有机构,形成一定的制度。中国历代保存下来的古籍“浩如烟海”,备受国际学术界的赞赏。中国的各种古籍,包括正史、官书、实录、丛书等,堪称研究亚洲邻国的历史、地理、民族、经贸、宗教与文化发展的“无价之宝”。国际著名的东南亚学家如 D. G. E. 霍尔等都非常重视中文史籍。陈序经先生说:“欲研究东南亚各国历史,尤其是古代东南亚,非用中国史料。”<sup>①</sup>

## 一、中国东南亚史学研究回顾

从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建立在近代科学理论与方法基础上的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新时期。进入 20 世纪后,以上海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为起始,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与华侨研究迈入了有组织的阶段,涌现了一批研究东南亚和南洋华侨史的学者。他们掌握外国语言工具,利用中国丰富的古籍资源进行考证,或对西方学者的著作进行翻译校注。他们所撰写的外中关系史、华侨史、海外交通史和史地考证等著作和译作,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术优势,道前人之未道,补研究领域之空白,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近代中国东南亚研究成为国际东南亚学的一支力量,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许多汉译学术名著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国老一辈学者就是这个学派中出类拔萃的人物。<sup>②</sup>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东南亚史研究获得新的发展。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推动下,我国对亚非国家的研究,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研究空前加强,从此我国东南亚史研究进入了更有组织的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为当代中国东南亚学有计划地系统研究打下了基础。

中国东南亚研究,包括史学研究受到国家的重视。在北京和东南沿海诸省,研究东南亚的机构在高等学校逐步成立。北京大学的亚非研究所、东方语言文学系、历史系亚洲史教研室就是中国北方进行亚洲研究,包括东南亚教学研究的基地。而与东南亚毗邻的福建、广东、广西和云南等省也以大学为依托先后建立了东南亚的学术机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56 年)、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

① 《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上卷,深圳海天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 页。

② 有李长傅、向达、方国瑜、凌纯声、张星娘、冯承钧、姚楠、张礼千等学者,他们的著作与译注作品可以说是新中国诞生前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代表作。

研究所(1959年)、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东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前身)(1960年)、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东南亚研究组(1962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重心。中国民间东南亚学术研究团体——福建省东南亚学会也于1962年成立。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已有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队伍。这支队伍既有老一辈的学术带头人,又有中国大学自己培养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其中有不少是归国的华侨。上述学术机构均出版了学术刊物,或定期编印学术资料进行学术交流。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创办《东南亚经济资料汇编》1960年更名为《东南亚研究资料》。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出版有《南洋问题研究》、《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季刊)并不定期出版《南洋研究所论文集刊》、《华侨问题资料》、《南洋问题文丛》、《南洋问题大事记》等。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出版有《东南亚问题》、《东南亚历史研究论丛》和《东南亚历史译丛》。它以东南亚历史研究为重点,出版了多种东南亚历史著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东南亚学术领域内的多数学者主要从事史学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以及华侨史研究是他们研究的主要项目。姚楠、陈序经、朱杰勤、陈碧笙、田汝康和韩振华等著名学者是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东南亚史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华侨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一些新的中青年学者中也做出了许多成绩。

不过,当时的学术研究也受到“政治挂帅”氛围的影响和政治运动的干扰,一些著作与教材常常片面地突出政治斗争与革命运动,比较封闭,缺乏对外学术交流。1966年开始(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东南亚研究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研究工作陷于停顿。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东南亚史学研究

1978年后,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有了巨大的变化和空前飞跃的发展。在“拨乱反正”的新氛围下,科学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1979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的建立是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三十多年来东南亚史学研究步入正规,发展迅速,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研究队伍扩大,研究实力增强。改革开放前,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队伍不到100人,专业学术团体不过五六家,主要在大专院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政府所辖的研究部门。到20世纪90年代队伍扩大,拥有了十多个专门研究东南亚或含东南亚研究内容的学术机构,并有了研究东南亚的民间学术团体,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人员多达六百余人,其中从事史学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近百人。南方沿海诸省的东南亚研究所恢复或创办起来,并出版了刊物,如厦门大学的《南洋问题研究》、《南洋资料译丛》,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山大学的《东南亚学刊》(后改为《亚太研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所的《东南亚》(后改为《东南亚研究》);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所的《印度支那》(后改为《东南亚纵横》)。此外,北京、上海、郑州、开封、福州等地的相关刊物也经常刊登有关东南亚史研究的论文。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代亚太》,北京大学的《北大亚太研究》、《东方研究》、《亚太研究论丛》,郑州大学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等刊物,均刊载东南亚历史的论文和译文。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培养东南亚领域的研究生,年轻一代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归国留学生加入研究行列,且人数日益增多,逐步形成老中青三代结合,以中青年为主体的研究队伍。

(二) 研究范围日益广泛,研究成果显著。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大陆的东南亚研究基本上仍是以历史研究为主要对象和内容,出版了一系列东南亚国别史和华侨华人

史,撰写的学术论文也以历史为主要选题。此时的重要著作有陈碧笙的《南洋华侨史》,吴风斌的《契约华工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所的《泰国史》,蒙文通的《越史丛考》,王任叔著、周南京等整理的《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下卷)和温广益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史》,李学民、黄昆章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史》,黄滋生和何思兵的《菲律宾华侨史》,刘迪辉的《东南亚简史》和庄国土的《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等。

198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东语系编的《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史论丛》,黄铮的《胡志明与中国》等是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专题性的研究著述。特别是1987年周一良教授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一书,包含有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文化交流史的专题,均由当时学界著名学者执笔,内容丰富翔实。<sup>①</sup>

南海诸岛问题研究是一个关系国家领海主权归属的重大课题。这一时期厦门大学南洋所韩振华、林金枝、吴风斌等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查阅中外文献资料一千多种,开展实地考察,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和《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此时还出版了多部古籍校注和多种经过整理的史料汇编和调查报告,成绩显著。重要的有:江应樑的《百夷传校注》,苏继<sub>卩</sub>的《岛夷志略校释》,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向达、陆俊岭的《西游录·异域志》校注,谢方的《东西洋考》点校,以及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所编的《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和《“猪仔”华工访问录》,中国历史研究所编的《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郭振铎、吕殿楼、王晟主编的《中国古籍中的柬埔寨资料汇编》,陈显泗、许肇琳等编的《中国古籍中柬埔寨资料》以及景振国主编的《中国古籍中有关老挝资料汇编》,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清实录〉有关东南亚史料》和郭明、黄国安等的《现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与《近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等等。此外,陈翰笙教授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十辑)第五辑“关于东南亚华工的私人著作”,汇集了研究东南亚华工的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些都是中国学者对东南亚学的独特贡献!

厦门大学林金枝教授等进行的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的研究工程取得丰硕的成果。林金枝著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sup>②</sup>,并与庄为玠主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广东卷、上海卷)共三卷,资料翔实,论证有力,在侨史界被公认为上乘之作。

20世纪80年代,翻译出版了多种东南亚史学著作,重要的有中山大学东南亚所译、D. G. E. 霍尔著:《东南亚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姚楠等译、约翰·F. 卡迪著:《战后东南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和《东南亚历史发展》上、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周南京、梁英明选译:《近代亚洲史料选辑》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贺圣达译、貌丁昂著:《缅甸史》云南东南亚所出版;马宁、段立生译、披耶阿努曼拉查东著:《泰国传统文化与民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中国东南亚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遍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华人华侨与国际关系等领域,大大超过了以前限于中国东南亚关系史、华侨史与史地考证的范围。东南亚现代当代问题和区域合作研究成为热门,科研的成果多种多样,研究方法也趋向多样化,既有综合研究、地区研究,又有国别研究以及专题(事件与人物)的研究。研究成果不仅数量

<sup>①</sup>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sup>②</sup> 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上大大超前,而且种类齐全,质量提高。这一时期,在史学方面的著作数量上的比重虽然相对下降,但中国学者撰写的东南亚地区史和国别史相继出版,华侨华人史的研究论著不断涌现,一些专著相继问世。

1. 东南亚地区史和国别史有王民同主编的《东南亚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梁英明、梁志明、周南京、赵敬合著的《近现代东南亚——1511—1992》(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余定邦的《东南亚近代史》(贵州出版社 2003年版)和贺圣达等的《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梁英明、梁志明等的《东南亚近现代史(上、下)》(昆仑出版社 2005年版),梁志明、李谋等的《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昆仑出版社 2006年版),梁英明的《东南亚史》(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等等。东南亚国别史有金应熙主编的《菲律宾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贺圣达的《缅甸史》(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王任叔著、周南京整理的《印度尼西亚近代史(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孙福生的《印度尼西亚现代史纲》(厦门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陈显泗的《柬埔寨两千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申旭的《老挝史》(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郭振铎和张笑梅的《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等几乎包括东南亚各国。何平的《东南亚的封建—奴隶制结构与古代东方社会》(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对东南亚古代社会的结构与性质作了比较深入的研讨,有关古代扶南社会是否经历奴隶制阶段的讨论是我国东南亚学界的一场颇有学术意义的论争,有助于研究的深入。近年陆续出版的有关东南亚历史研究的学术论文集,汇集了我国一些东南亚历史学者多年的研究成果。<sup>①</sup>

2. 东南亚华侨华人史历来是我国学者得天独厚的重要研究领域,这一时期有老一辈学者的新作问世,如朱杰勤的《东南亚华侨史》、陈碧笙的《世界华侨华人简史》;有中年学者吴凤斌主编的《东南亚华侨通史》、李国梁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杨昭全的《朝鲜华侨史》和《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上、下)》、温广益的《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林远辉与张应龙著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赵和曼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研究》和青年学者黄小坚的《归国华侨的历史与现状》等等。有关华侨华人史的专题研究日渐深入,例如,周南京的《华侨华人问题概论》、丘立本的《从世界看华侨华人》、梁英明的《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庄国土的《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和《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商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曹云华的《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林金枝主编的《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任贵祥与赵红英合著的《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李安山主编的《中国华侨华人学——学术定位与研究展望》、李明欢的《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等。侨汇侨批问题是一个侨史研究的新课题,学者从事调查,利用档案资料进行研究,林家劲的《近代广东汇侨研究》和袁丁的《近代侨政研究》是关于这方面的重要论著。一些学者将历史研究与社会实地考察结合起来,运用多学科的方法研究华侨华人史,涌现了一批新的佳作。<sup>②</sup>

3. 东南亚国际关系史和海外贸易与交通史,特别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的研究,在这一时

① 孙福生:《东南亚地区史和国际关系论集》,香港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梁志明:《东南亚历史文化与现代化》,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陈显泗:《让湮没的历史重现》,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6年版;戴可来、于向东:《越南历史与现状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李一平:《东南亚研究论稿》,大通出版社 2004年版。

② 高伟浓:《东南亚华人信仰诸神考》、段立生:《秦国的中式寺庙》、曹云华:《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曾少聪:《东洋航路移民》、曾玲:《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和《越洋再建家园》、韩方明:《华人与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范若兰:《移民、性别与华人社会:马来亚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年)》、程希:《侨务与外交关系研究——中国放弃双重国籍的回顾与反思》等。

期获得更为快速的发展,有一系列著作问世。如韩振华先生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和朱杰勤先生的《中外关系史论文集》均有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专题考证与论著。李金明和廖大珂合著的《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陈希育的《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余定邦和喻常森的《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何芳川的《太平洋贸易网五百年》、聂德宁的《近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研究》、高伟浓的《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葛治伦的《中泰关系史》、余定邦的《中缅关系史》、黄国安等著的《中越关系史简编》、黄铮的《中越关系史辑稿》、张秀民的《中越关系史论文集》、王介南和王全忠的《中缅友好两千年》、林仁川的《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余思伟的《中外海上交通与华侨》、廖大珂的《福建海外交通史》等,均是具有学术参考价值的重要著作。

云南省东南亚研究的学者在中泰关系史领域有重大贡献。泰族起源和南诏国问题,历来是泰国古代史和中泰关系史中有争议和国际影响的问题,中国老一辈学者曾发表过自己研究的著述。<sup>①</sup> 20世纪70年代始,云南省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的学者们成立了研究组,发表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探讨了泰族起源和南诏国族属等问题。陈吕范等学者用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泰族不是起源于阿尔泰山、川陕地区,并进一步论证了南诏国不是泰族建立的国家。<sup>②</sup> 《历史研究》发表了杜玉亭、陈吕范:《忽必烈平大理后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的学术论文<sup>③</sup>,译成泰文后,在泰国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泰国学者和有关人士纷纷发表评论,掀起了一个泰族起源问题的研究热潮。此后中泰两国学界通过各种方式开展了研究,国际泰学界也连续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促进了泰族起源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对中泰友好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很好的影响。<sup>④</sup>

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展了对海上丝路的研究。陈炎先生撰写了一系列这方面的论文,1990年结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海上丝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论文集内。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炎文集》<sup>⑤</sup>又完整地汇集了他的研究成果。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在中国学界备受重视。不少地区建有专门研究团体。江苏省的郑和研究会编辑出版的《郑和研究》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郑和研究的学术论文。海洋出版社等出版有多种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论文集。1993年孔远志教授用印尼文撰写的《郑和与印尼》在雅加达出版。在2004年郑和远航600周年纪念之际,北京、南京、昆明、福州等地都举行了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专题论文集。<sup>⑥</sup> 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在海外引起关注。

4. 东南亚文化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贺圣达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梁立基、李谋等的《世界四大文化与东南亚文学》、梁立基的《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下)、杨保筠的《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王介南的《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李谋和姜永仁合著的《缅甸文化综论》、梁敏和与孔远志合著的《印度尼西亚文化与社会》、栾文华的《泰国文学史》、周伟民和唐玲玲的《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等。陈玉龙先生在《汉文化论纲》一书中对中越文化交流史作了

① 凌纯声、方国瑜、许云樵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著文指出:“泰族建南诏国说”的谬误。解放后,江应樑等又曾撰文论证“南诏国是彝族和白族先民建立的政权”。

② 陈吕范:《中泰关系若干问题研究课题小结》(代序)载陈吕范主编:《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上)》,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③ 杜玉亭、陈吕范:《忽必烈平大理后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

④ 陈吕范主编:《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上、中、下),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⑤ 陈炎:《陈炎文集》(上、中、下),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⑥ 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江苏省郑和研究会:《睦邻友好的使者——郑和》,海潮出版社2003年版;王天有、徐凯、万明编:《郑和远航与世界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全面翔实而系统的论述。<sup>①</sup> 2008年,何芳川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下两卷本,内含中国与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内容,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是中外文化交流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5. 东南亚专题著作的问世是这一时期的新气象。例如,王士谷的《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内有东南亚的华人报刊;梁志明主编的《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是研究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及其对东南亚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影响的史学专著。东南亚民族问题的研究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新学科。范宏贵的《同根生的民族——壮傣各族渊源与文化》、何平的《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察与重构》是这方面的力作。东南亚宗教与政治问题的研究有段立生主编的《东南亚宗教嬗变对各国政治的影响》(曼谷大通出版社 2007年版),李晨阳的《军人政权与缅甸现代化进程研究》(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南部海域边疆和史地研究也有不少重要成果,尤其是中越边界问题有一系列论著,李金明的《中国南海疆域研究》和《南海波涛——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以及李国强、肖德浩、黄峥等撰写的关于南海诸岛、北部湾和中越边界问题的论著。

6. 东南亚中文古籍和史料整理是中国学者历来的强项,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有一系列新作出版,如戴可来、杨保筠点校的《岭南摭怪等史料三种》,萧德浩、黄铮主编的《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和余定邦等编校的中国古籍中关于缅甸、泰国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资料汇编。<sup>②</sup> 厦门大学与莱顿大学合作的《吧城华人公馆(吧国公堂)档案丛书:公案簿》已出版9辑,还将陆续出版。<sup>③</sup>

7. 历史工具书的出版为东南亚史学研究提供了基础性参考书,这一时期有姚楠主编的《东南亚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5年版)、周南京主编的《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和《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共12卷,1200多万字,内含东南亚华侨华人史词目,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9—2002年版)等陆续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获得好评。此外,北大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先后出版有研究丛书三十多种,其中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研究占有颇大的比重。

8. 外国史学名著翻译也有新的成就。例如,陈重金著、戴可来译:《越南通史》(商务印书馆 1992年);尼古拉斯·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I、II)》(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北京大学东语系缅甸语专业李谋等译注的缅甸古典历史名著《琉璃宫史》三卷本(商务印书馆 2007年版);赛代斯著、蔡华、杨保筠译:《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商务印书馆 2008年版);戴维·K.怀亚特著、郭继光译:《泰国史》(东方出版中心 2009年);安东尼·瑞德教授著,孙来臣、李塔娜、吴小安翻译审校的《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两卷本(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

三十余年来,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和进展,不仅在成果的数量上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二十多年,而且研究的范围空前扩大,质量日益提高。其中一些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泰族起源问题、南海史地考证、华侨华人企业研究与华侨华人大型工具书的编撰等。科研成果种类齐全,既有专著、论文、教材、译著和译文,又有丛书、古籍整理、资料汇编以及手册、概览、词典、百科全书和目录索引等工具书。

① 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② 余定邦、黄重言:《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和《中国古籍中有关泰国资料汇编》等三种。

③ 包乐史、吴风斌、侯真平、聂德宁等校注:《公案簿》(1—9辑),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0—2009年版。

不过笔者了解可能并不全面,以上列举一些代表性著作仅供参考,若有遗漏,请予补正。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中国大陆东南亚研究的方法与时俱进,研究视角与层面日益多样化。学者们坚持把理论与实际、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既继续进行素有根基的国别研究和专业研究,又开展了综合性整体研究和区域性研究。学者们特别是青年专家努力吸收国际前沿研究成果,采用多学科的理论、比较研究或定量分析的方法以及口述调查方式进行研究,为我国东南亚研究注入了新鲜活力。

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在推动学术交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研究会成立后坚持增强学术研究与合作交流的宗旨,相继在昆明、厦门、广州、南宁、海口、北京、南宁等地召开了七次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同时主办或协办了多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各地学会组织也举办了一系列专题性研讨会。各种会议规模不同,形式多样。厦大、暨大、中大、云南与广西的东南亚所的东南亚学术刊物和研究会委托郑州大学历史学系越南研究所承办的《会讯》多年来坚持定期出版,有力地促进了学术信息和研究成果的交流。

### 三、中国东南亚史学研究的评估与展望

综上所述,在我国地区与国别的研究中,东南亚研究的基础较好、研究力量较强,而且是成果较多的一个领域。但与国际先进研究水平相比,与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科学研究多出佳作、精品的要求相比,当前我国的东南亚研究在理论、方法与组织等方面确实存在不小差距。我们不可故步自封,而应更新观念,调整自己的研究视角。研究东南亚的中国学者在继续摒弃“欧洲中心论”的同时,还需注意避免和克服“中国中心主义”倾向。因此,树立全球意识,从世界和东南亚地区的角度考察和研究东南亚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是我国的东南亚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当前,东南亚的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区域合作进程加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贸易、文化和外交关系在不断发展,东南亚史学研究任务仍然任重道远!东南亚学的兴衰,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加快我国东南亚研究的步伐,我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坚持“双百”方针,鼓励创新,重视学术质量,进一步树立精品意识。在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科研成果的选题和研究力量的配置必然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当前的研究工作中,仍存在急于求成、虚夸浮躁、抄袭作假等现象,这既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也阻碍队伍的培养。尽管已不断推出许多科研成果,在许多方面有新的开拓,并填补了一些空白的领域,但仍缺乏高水平的精品之作,尤其缺乏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第一流的传世之作。为此要坚持“双百”方针,鼓励创新,提倡不同观点的争论,大力开展健康有益的学术评论,发挥集体智慧,加强协作,我们的学术才能繁荣昌盛,才会不断产生高水平的优秀著作。

第二,树立全球意识和问题意识,提高理论水平,提高外语水平和现代科研能力。这是赶上和达到国际前沿学术水平的关键。我们的研究应尽力将宏观研究与微观考察密切结合起来,既善于从全球的整体视角探索东南亚的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又能充分发掘和掌握第一手资料,进行实证阐述与个案考察。研究课题应具有前沿性、开创性,应在了解国内外学术动态和学术史的基础之上设计,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雷同。外语是研究工作的工具和学术交流的桥梁,我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外语的培训。特别是双语种的培训,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大语种的水平,让

年轻一代的学者能够自由地和外国学者对话交流,同时必须重视培养掌握东南亚国家语言的小语种人才。

第三,重视东南亚教学和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东南亚教学研讨会应形成制度,定期召开,以加强国内各院校的交流合作,并组织编写有质量的教材。我们建议教育部应把东南亚教学列入大学本科教程。大学教师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把教学和培育人才放在第一位,将教学与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同样可以做出许多科研成果。

第四,加强应用研究,不可忽视基础研究。我们的研究仍须坚持“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应用研究”的战略方针。现实政治与国际关系问题理所当然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但人文与历史、考古等基础学科不可忽视,学科建设需保持均衡、全面的发展态势,有重点,但不可偏废,不可厚此薄彼,顾此失彼,将基础研究,包括东南亚古代历史的研究边缘化,长期下去,将带来战略性的失误!

第五,加强东南亚学科建设,建立完整的东南亚研究体系。当前中国东南亚学的重要目标应是建立完整的东南亚研究体系,并将我们的队伍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国际水平与雄厚实力的研究队伍,这是一项光荣而十分艰巨的战略任务。这一重担就落在我们从事东南亚学的教学研究人员,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肩上。为此,应开展关于东南亚学科建设的讨论,深入研究东南亚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问题,群策群力,加快中国东南亚学的建设。

[本文作者梁志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一平,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马新民)